

困学集

罗尔纲著



困学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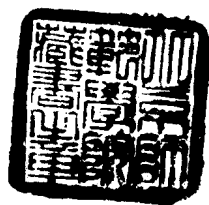
罗尔纲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7562

中 华 书 局



1097562

责任编辑：于世明

困 学 集

KUN XUE JI

罗 尔 纲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7³/₈，印张·385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统一书号：11018·1396 定价：3.65元

序

一

这几年来，出版单位要我写部自传。一些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的单位也要我写短篇自传。刊物杂志又要我写些为学记。他们的目的都同是要我把治学经验写给青年人作参考。我是个一无所知的人，一生都在困学当中，我能够有什么治学的经验写给青年人呢？所以除了回答《书林》杂志社提出的问题写过一篇《我是怎样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子的？》短文外，都婉辞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我给谷霁光同志《史林漫拾》写了一篇序。在那篇序文上，说我当初研究太平天国史时，由于不懂得通与专的辩证关系，就只专读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资料，与此无关的一概不读，以为这样不致浪费时间，殊不知适得其反。我于一九三一年就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直到四十年代研究天历时，因为没有历法知识，才认识到要求“专”，必须先“通”的道理。其后有关太平天国史的种种问题，诸如政体、军事、社会以至艺术、建筑、戏剧、音乐等等问题，一件件都在我的工作日程上提出来了，使我处处感到不“通”。我说了一件往事。五十年代初，我在《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的卷首印有《李秀成自述原稿》和《李秀成谕李昭寿书》及《李秀成答辞手卷》三种照片对照，说三者都是李秀成的手迹，以证明《李秀成自述原稿》并非赝品。到一九五六年，有一位同志把我书上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和《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两种笔迹照片送请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经法医研究所的专家鉴定不是同一人的笔迹。

这位同志据此发表论文断言《李秀成自述原稿》为曾国藩伪造，引起了史学界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问题一场大讨论。那时，我在南京工作，正在青岛养病。组织上派丁云青同志来看我病。丁云青同志是一位精通书法的学者。他认为《李秀成自述原稿》是真的^①，但对那两种照片，也认为不是同一人的手笔，劝我把笔迹对勘这一点放弃去。不久，我从青岛到北京医病，我心里总放不开这事，我感到多年来细看这两种文件的笔迹神韵完全一致，我并没有错，但是，神韵是抽象的，怎能使人信服呢？从冬天苦思，经春历夏，想不到方法解决。有一夜，我忽然想起，试把那两种文件笔画拆开来对照看看，这样一拆，同是一人的笔迹，就具体地显现出来了。我寄去南京请丁云青同志指教。他看了，笑对同志们说：“罗先生做对了，他用的正是书家八法，但他却不知道书家八法。”他立即回信给我，教我去借宋朝陈思《书苑精华》、明朝张绅《法书通释》、潘之淙《书法离钩》、清朝《佩文斋书画谱》、冯武《书法正传》、程瑶田《书势》等书来读，明白书家八法后，就用八法理论来说明我所拆的笔画对照。我照了他的指教，学懂书家八法后，才能写成一篇《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②，取得书法专家与史学界的同意，解决了《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问题。谁知道研究太平天国史，也要懂得书家八法呢？然而事实却如此，你不懂书家八法，就不可能解决《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这一个大问题。这一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到不“通”，不“博”，就不可能去做“专”业。我那

① 他写了一篇《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一文，在《文史哲》一九五七年第三第四期上发表。

② 这篇考证，先把它提要并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考证》一文内。同时，又把它全文编入一九五八年三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一书内。

篇序文，先刊于《南昌晚报》上。发表后，《南昌晚报》编辑部给我来信说反映很好。我也接到几位读者来信，说他们读后，认识到通与专的辩证关系，也使他们从无知追求有知增加了勇气。我写那篇序文时，只是想把我的不通故事，来与谷霁光同志初治学时懂得通与专的辩证关系就能左右逢源作个对比，完全想不到会使读者如此反应。

一九八一年秋，我写的《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出版了。一九八二年秋我注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也出版了。我接到几位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位读者是个残废的青年，他说他看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的《前言》后，感动到流了泪，他要学我历经四十九年，好似乌龟爬行一样去钻研学问。又有一位同志，说看了这两部书后，希望我多多力作，“去照亮更多的人”。

在旧社会，我从来不曾见过青年人有这样求知热。今天青年人这种求知热，是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培育出来的。我以无限喜悦的心情迎接青年人这种求知热，使我不由得想到我的责任。我虽然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谈不到“老马识途”，但在漫长的治学的道路上，多少也会得到一些经验教训。既然青年人感到对他们有借鉴的作用，如果从自己写作里面，挑选一些含有经验教训、可作借鉴作用的文章编为一部，以供参考，这还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因此，才有这部《困学集》的编辑。

这部集子，是从我写的约四百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因为这些文章，都是我在困学当中写的，所以叫做《困学集》。本来还要选辑《改造记》的检查文章，以见党对我的教育改造，后因那些文章都是在历次运动中写的，其中都有重复的地方，其改造的经过，线索也不够分明，须要重写，因目下工作繁重，没有时间，只得把这一辑取消，如果将来要写自传，那时当特别注重来写吧。

二

本集共分五辑。第一辑为《考证文选》(一),共收《水浒真义考》、《洪大全考》、《洪大全考补》三篇。

《水浒传》的原本是到聚义厅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大聚义为止呢?还是有招安、征辽、平方腊才完呢?这是一个四百多年来悬而未决特别是近六十年来成为争论的中心问题。《水浒真义考》一文,追寻出“水浒”的词源,把袁无涯、金圣叹等人所加的“金箍儿”挣破,初步考出《水浒传》原本是“有志图王”传曾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罗贯中于明朝洪武年间著的。其主题思想是“替天行道救生民”和“替天行道公平”。全书以梁山泊大聚义后惊梦结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后二十九回,则是明朝宣德、正统以后的人续加的。其目的是借所写宋江、卢俊义等招安后征辽、平方腊立了大功,被宋徽宗鸩死故事,来发泄他对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不平。这个续加的人,为了把前七十一回与后二十九回极为勉强地牵合起来,又盗改了前七十一回一些关键地方,并布置了一些“伏线”。这篇考证,于一九八三年发表,第二年得见古本《三遂平妖传》,予以证实^①,请读者教正。

“天德王洪大全”是太平天国史上一大公案,从清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案件发生起,清朝廷臣就向清帝提出否认的论据,但此事既已形诸章奏,登诸实录,载于方略,已俨然成为史实,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便以此案作为“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的典型例子。《洪大全考》一文,考出天德王洪大全是清朝钦

① 请看拙著《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刊于《学术月刊》1984年第10期。

差大臣赛尚阿在广西永安州大败,“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以稍掩己过”,而捏造出来的。帮助赛尚阿捏造洪大全的人是他的机要幕僚“专司摺奏要件”的丁守存。追查他们捏造人(天德王洪大全)证(供辞)的根据和丁守存种种作伪的行为和手法。并从残缺的史料考出这个被赛尚阿捏造作为“天德王洪大全”的本人,是湖南兴宁人,叫做焦亮,有妻许月桂,有弟焦玉晶,当他被俘死后三年,广东天地会攻克湖南郴州时,许月桂称大元帅,焦玉晶充当三省军师,起义响应。焦亮之弟与妻当是天地会中人,他也应该是天地会中人。此文刊于一九五五年。几年之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周天爵原奏摺,证实了我断定《剿平粤匪方略》上所载周天爵太平天国领袖人物,以“洪大泉、冯云山为之最”,是当年纂修《方略》的亲王、大臣和史官们的盗改。又从陆续发现的资料,考出焦亮是湖南天地会山堂里面的一个叫做招军堂的领袖,又证实了我所考焦亮当是天地会中人的判断,把这些新发现,写了《洪大全考补》一文。于是这一个一百多年“天德王洪大全”疑案,经过近四十多年来展开的大争论,到此才得到了大家一致同意的结论。

第二辑为《考证文选》(二),共收《假设举例——李秀成伪降考》、《本证举例——彭玉麟画梅本事考》、《辨伪举例——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忠王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四篇。

假设是一种科学方法,先从观察入手,次在观察的基础上,对这些事实进行分析、归纳,导致假设的形成。社会科学证明假设,虽不能同自然科学那样用实验来证明,但却可用已知事实来检验,再通过一些新的佐证文献,就可以成为定论。它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并不是研究的开始,而是研究成果的初步概括。太平天

国忠王李秀成是个“铁胆忠心”的英雄，被俘时，曾国荃用刀割锥刺的酷刑要杀害他，“流血如注”，他“殊不动”。后来曾国藩派人通知他要处决，他听了，“无感容”，到去刑场的时候，“谈笑自若”，临刑，“作绝命词十句，叙其尽忠之意”。但他在囚笼中，写了一部自述，提出“收齐之章程”，而世上却有他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的传说。这篇《李秀成伪降考》，便是用假设方法去考证问题的。我先观察《李秀成自述》，看出它虚假的地方共有十二项，那些有可疑而尚未证实的还不在于内。接着，根据这个事实基础，进行研究李秀成为什么不断地要说这样多的虚假话。经过对李秀成是为要掩盖假投降的意图而说呢，还是为要投降怕敌人不肯相信而说呢，正反两方面种种历史事实作了考查，然后作出李秀成伪降这一个假设。于是再通过历史条件、当时敌我形势、曾国藩与清朝尖锐矛盾、曾国藩家人和部下要拥戴他做皇帝、李秀成的教育、“外柔内刚”的性格和专以智取的谋略等六项历史事实来检验李秀成伪降假设，项项都给伪降假设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项项都与伪降假设吻合。假设经过检验，经得起检验，假设便可以成为定论。最后，还得到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教授亲笔写下了一条她的母亲——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对她说的李秀成劝曾国藩做皇帝，曾国藩不敢的曾家口碑。这一条曾国藩家人自己说的口碑，正是一条千真万确的证实了我所提出的李秀成学三国姜维伪降曾国藩的假设的铁证。

《本证举例——彭玉麟画梅本事考》一篇，用考证彭玉麟画梅本事来说明本证在证据上的重要性。什么叫做本证，用本人自己写的文件，来证明本人的行为，就叫做本证。《红楼梦》著者之所以得考明，就是以曹雪芹在书中第一回的自述为证。彭玉麟童年时，在安庆与舅父王家同居。他的外祖母有一个养女，叫王竹宾，比他年纪大一些。他俩“少小相亲意气投”，曾私订下终身之愿。到十

七岁，他跟父母回到他的家乡衡阳来。过了十二年，舅父死了，把外祖母和王竹宾接来衡阳。这时候，他已经娶妻邹氏。王竹宾到衡阳后不久便出嫁。在王竹宾出嫁前，他和王竹宾曾有一种非常的图谋，只因“决断迟”了，便把时机错过。王竹宾嫁后四年，因难产亡。他含恨终生，画梅万本，借梅花来悼念他的情人王竹宾，来写他的“帷房悼影”的伤心恨事。彭玉麟画梅纪念情人的事，是众口一词的。但他的情人是谁，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根据俞樾编的《彭刚直公诗稿》，从彭玉麟感怀诗中考清楚了这一件恋史。在我所做的考据工作中，同彭玉麟画梅本事那样，求证结果，丝丝入扣，处处合拍，有如证几何，实所未见。为说明本证的重要起见，所以写了这篇考证。关于这篇考证，还有一点要提出来说的，就是同知道解决问题要找本证了，但是，要找那一种本证呢，还必须仔细考虑过的。彭玉麟画的梅花是送给人的，连外国使臣都赠送，有些还刻在寺院、名胜的壁上。有一位研究这问题的作者，他没有考虑到谁都不愿把自己的伤心恋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特别封建时代有着种种礼教的束缚，更是如此。他却认为彭玉麟既是画梅来纪念情人的，那在画梅题诗上就可以找到本事了。于是他“费了十几年的心力”，搜集彭玉麟梅花刻石和墨本，作了长期专门的研究，在梅花题诗中，找到“修得梅仙嫁作妻”一句诗，就断定彭玉麟的情人叫做梅仙，写了一部《彭玉麟梅花文学之研究》专著出版。我看那部专著，觉得他并没有解决问题。彭玉麟固然是为着纪念情人而画梅，但他断不会把真人真事记在题画诗中。他所题的《梅花诗》都是虚无缥缈的，所咏的“梅仙”也同样是寄托的，而这位著者却认为真，所以便错了。因想到古人做的诗，一般都是死后才由后人编辑付刻的，“死后是非谁管得”，那是与生时送人的画上题的诗不同。彭玉麟写了许多《感怀诗》，要找他的恋爱事，就应该到那里

去找，至少有蛛丝马迹可寻。因把书架上两册彭玉麟诗集取来翻查，果然，不到两个小时，就把彭玉麟的情人姓名、身世、相亲、相爱、分离、重聚、出嫁、死亡、哭灵、入梦等等情事都一清二楚地查出来了。对彭玉麟画梅本事这一考证，我和那位著者都同知道要从本人的文件上去找“本证”，但是，一个把本证抓错了，就“费了十几年的心力”，劳而无功，另一个却把本证抓对了，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本事考清了。两两对比，可见做考证工作要抓什么的重要一至于此。

《辨伪举例——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篇，是一九五五年发表的。在我发表此文前，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们几无例外地一致认为它是一部重要的太平天国史料。有人根据它来考证太平天国的法律与印行的书籍，有人根据它来考证天朝田亩制度与太平天国的考试制度、省制等。在当时争论最激烈的洪大全问题上，被列为证明确有洪大全其事的两大证据之一。他们在考证太平天国史的工作上，都把它所记作为断定太平天国史事的最重要的根据，即使遇到文献具在，记载分明，千真万确的史事，而因它独有不同的异说，也居然根据它来怀疑真实的历史。这部大伪书，对太平天国史以伪乱真，到了怎样的地步，发生了怎样严重的恶影响，可以想见。作伪者伪托是赞王蒙得恩最亲近的侍从，自称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在武昌被蒙得恩俘虏，一直随侍蒙得恩到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天京失陷前一天还在京内，连蒙得恩“内室”情况都知道的那样一个关系密切的人。可是，据书中所述，他把在金田起义时已经约四十岁的蒙得恩，说成是“仅十九岁”，蒙得恩不但有一个在太平天国晚期与干王洪仁玕共同执朝政的长子蒙时雍，还有四个儿子，而他竟说蒙得恩“无子”，甚至蒙得恩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已经病死了，而他竟说于甲子

十四年六月天京失陷前，亲在蒙得恩家中看见蒙得恩的种种行动。我就是从这些荒唐的叙述里边，首先根据历史事实揭穿了作伪者的伪托和种种虚构。接着追寻出了这部大伪书的根据，再从他所根据的材料，分析出作伪十五种改窜、增添、附会的手法。文章发表后，同志们都同意我的考证，才在太平天国史料里清除了这部大伪书出去。近年好几位同志做辨伪考据，在他们的文章上，都说得到了我这篇考证的启发。这是同志们对我的鼓励，给我的光荣。

《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一篇是一九五六、五七年间，因李秀成写的《谕李昭寿书》与《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照片，经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不是同一人的笔迹，而引起对《李秀成自述原稿》真伪问题大讨论时写的。本文根据书家八法的理论，具体地、显著地分析出《谕李昭寿书》与《李秀成自述原稿》从表面看是有差异的，而实是李秀成一人的手笔，提出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的说法，写了这一篇文章。发表后，得到书法专家与史学界的同意。笔迹的鉴定，有关历史文物的鉴定，也有关司法的定案。历史文物鉴定错了，就会以伪乱真，司法鉴定错了，就会失出或失入，有关人命。所以，对笔迹鉴定的方法是应该加以研究的。

第三辑为《考证文选》(三)，共收《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调查记》、《绍兴太平天国壁画调查记》、《南京普渡庵调查记》三篇。前两篇是对所调查的壁画鉴定是“真”或“假”，后一篇是对所调查的事件研究“有”或“无”，并不是调查的记录，而都是对调查的考证。

《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调查记》一篇，是鉴定堂子街壁画的考证。一九五二年南京堂子街发现太平天国壁画，画面上没有题字，旗子上也没有写上太平天国四字，初看时原是茫然一片的。后来我经过仔细观察，看出两个最显著的可以代表全部壁画的特点：

一个是壁画上必须有个人或应该有人物的画面都不绘人物，另一个是与清代的和古代的形式不同的望楼建筑。我就根据这两个有代表性的特点提出了一个假设：壁画不绘人物可能是太平天国的制度，这种望楼建筑也可能是太平天国望楼的新创的建筑。于是从史料中进行求证，从而证实了堂子街壁画，确是太平天国的壁画。这篇鉴定，对做考据工作，如何抓要点，提假设，求证明，是一篇很具体的说明。

《绍兴太平天国壁画调查记》一篇，是一九五三年去绍兴调查太平天国壁画的鉴定。绍兴的壁画大部分是人物画和神怪人物画，并且有佛教画。这些壁画，不但违犯太平天国制度，而且，与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对立。此外还有些残存的龙、凤等壁画。我去调查，所有住宅上绘有壁画的屋主，不论人物、神怪和佛教壁画也好，龙、凤等壁画也好，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太平天国的壁画。而根据记载，太平天国又确曾在绍兴绘有壁画。我鉴定绍兴这些壁画，经过调查、研究，根据许多方面已经肯定的事实，断定那些残破的龙、凤等壁画确是太平天国的壁画，而对那些存在着种种疑问的人物神怪壁画，则提出了是由于绍兴地主阶级诬蔑太平天国用人血绘壁画，诬蔑太平天国在房子里杀人埋死尸，所以在太平天国退出绍兴后，有些地主阶级的房子，便在太平天国绘过壁画的墙壁上，另绘上与太平天国信仰对立的東西为他们所崇奉并且认为可以“辟邪”的神佛人物故事来加以“厌胜”。因为这些壁画，是当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就在太平天国绘过的壁上绘的，所以一代代传下来便误传是太平天国壁画这一个解释。今天回想起来，我处理这个复杂、矛盾的问题，是把真的肯定它是真的，把假的指出它是假的，而假之所以作真，是由于假的是在真的位置之上绘的，所以才把假的误传为真的。这是必须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才看得出来

的。可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冬初研究这问题时，还受着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的束缚，我那时候看来，认为这些壁画应该全部否定的，完全看不出假中有真，假的还是从真的遗迹上重绘误传下来的这一个事实。后来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极力挣破旧思想方法的束缚，不断地苦思，才在复杂矛盾的情况之中，逐渐地看得出来。这篇考证，深深地铭记着我的思想改造的艰苦过程。

《南京普渡庵调查记》一篇，是调查研究所谓天王元妃在普渡庵出家有无其事的考证。这次事件，经过五年，最后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采取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才解决了问题。作伪的事件，是从古以来就层出不断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去伪求真，教导我们工作要走群众路线。这篇调查考证，表明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揭穿作伪者最好的工作方法。

第四辑是《探索文选》，共收《我对纪传体的改变》、《我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批判与继承——〈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的体例》、《我对太平天国资料的发掘与编纂》、《〈艺风堂金石文字目〉错误举例》四篇。

《我对纪传体的改变》一篇，是记我写《太平天国史》对所用体裁进行的探索。我写《太平天国史》系用纪传体。从四十年代起，至八十年代，根据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原则，对这种体裁应该怎样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怎样去“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长期进行探索，不断地加以改变。这篇文章，便是探索经过的记录。纪传体是我国封建皇朝“正史”的体裁，具有浓重的封建性。我试用这种体裁来写太平天国史，怀有极大戒心。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尤其使我感激的是范文澜同志对我的鼓励和教导。

《我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批判与继承——〈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的体例》一篇，是记我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所定的体例。裴松之注《三国志》，网罗繁富，注重史实的增补和考订，这是他的卓识；但他对原文的音切和解释并不详备，他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不免有主观，又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这是他的缺点。我批判他的缺点，吸收他的优点，定出训诂与事实的增补及考证并重的体例来注《李秀成自述原稿》。

《我对太平天国资料的发掘与编纂》一篇，是我在南京十年发掘与编纂太平天国史料的总结。我在发掘工作方面得到的一些经验，和用地区编纂方法来尝试编纂一千万字的史料，都是从艰苦探索中得来的。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讹误举例》一篇，是三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做的整理金石拓本里面的一件工作。我做这件工作以前，不但没有学过金石学，连金石学这个名词都不知道，当时，晚上读金石学的书，白天去做工作，边学边干，担负了这一个工作。这种校勘方法，也是从艰苦探索中学去的。

第五辑是议叙文选，共收《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起源》两篇。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一篇，叙述太平天国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国家最高权力由军师行使，但天王对君位本身却具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一种在国家组织中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政体。本文是根据我写的《太平天国政体考》^①，和《太平天国政体

① 此文刊于《历史学》季刊第二期。

考再稿》^①两篇考证来叙述的。它不是考证,而是根据考证的结果来叙述的,所以收在本辑内。

《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起源》一文,是一九三六年写的^②。我读清史,知道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朝。咸丰以后,这副统治机器给太平天国打破了,造成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而其转变的关键,则在于兵权落在将帅手。我根据历史事实,写了这篇文章,提出清代兵权在咸丰前掌握于中央,其从中央落于私人之手,则始自湘军这一个假设。其后七年,我写成《绿营兵志》、《湘军新志》两书,证实了这一个假设。本文是一篇提出有待证实的假设的文章,但它不是考证文,也不是论文,所以收在本辑内。

第六辑是《论文选》,共收《太平天国史上的人民群众》、《论湘军》两文。

《太平天国史上的人民群众》一篇,是我写的《太平天国史》第一卷《序论》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列举出人民群众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决定力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真理。

《论湘军》一篇,是我于一九八〇年重写的《湘军兵志》一书第一章绪言。从前有个被称为军事学家的蒋方震论湘军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虽然书生之变相,则

① 此文刊于我著的《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

② 此文刊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五卷第二期。

官僚也,民兵之变相,则土匪也,故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湘军真是历史上一奇迹吗?湘军是反革命巨魁曾国藩组织的新军,蒋方震把它认为民兵,是大错的。作为湘军将领的书生是地主阶级,它的士兵则为农民。湘军崛起的目的,不是如同蒋方震所说,要达到二千年来书生的至高理想,作为“王者师”,而是为保卫地主阶级。这与我国古代民族间战争,民兵与其率领者共同为保家保国而战的性质不同。湘军士兵与其将领的关系是敌对阶级的关系,其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当他们认识到被蒙蔽、受欺骗,幡然醒悟的时候,就加入哥老会来反抗地主阶级,推翻清朝统治。这并不是“历史上一奇迹”,从湘军的历史看来,是一清二楚的。本文驳斥了蒋方震的谬论,也给研究历史,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才能看得清楚历史事实,和“论”必须从“史”出,作了说明。

第七辑是《困学记》,共收《我是怎样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子的?》、《说考据》、《〈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重印题记》、《〈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重印题记》四篇。

《我是怎样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子的?》一篇,是自述我因受到五四时代辨伪风气的影响,从一个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辨伪问题引起我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做整理金石拓片工作所得的锻炼。

《说考据》一篇,是今年据一九五五年我写的《试说考据在历史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①,和一九五六年写成《太平天国史论文集》七集后写的《跋》^②两文写成的。对我的考据工作做了初

① 刊于《科学通报》一九五五年四月号。

② 见《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七集》)跋。